

我斗在大西北

罗元发

封面设计：张博智
地图绘制：宋继同

战斗在大西北

罗元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1印张 220千字 插页9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21,000

统一书号：3098·224 定价：0.98元

解放大西北的第六軍

1949年
六月
王震

建设新疆

保衛新疆

穆罕默德



毛主席在转战陕北途中。



彭德怀司令员在青化砭战役中与习仲勋（左三），张文舟（左四）、徐立清（左一）等同志视察地形。



我西北野战军正开赴前线。



西安人民街头游行，欢庆解放。



兰州战役，我军在黄河铁桥追歼残敌。



彭总在兰州维吾尔族群众的欢迎会上讲话。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彭总和王震同志在迪化阅兵台上。



一九五〇年·六军广大指战员在迪化拉石头修建和平渠。

序　　言

看到罗元发同志写的革命回忆录《战斗在大西北》，我很高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把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风起云涌的光辉历程整理出来，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彭老总直接指挥下，以一比十的兵力，战胜敌人的。当时，胡宗南进攻延安，用了三十四个旅共二十三万人，而我们的兵力仅有两万五千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方面头等，并为反共反人民战争进行了长期的训练和准备。但我们终于以极其悬殊的兵力和劣等的装备，打败了强大的敌人。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延安，打到了蒋管区。两年半时间，便解放了整个大西北。罗元发同志以自己亲身的战斗经历，叙述了原西北野战军第六军的战斗历程，真实地反映了这光辉的一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部队。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后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继而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一九四三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进攻，党中央决定从两个抗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和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抽调了部分兵力到陕甘宁、晋绥，属贺龙、徐向前、习仲勋同志领导下的联防军建制，进行屯垦和练兵，保卫党中央。这两支具有丰富战斗经验、英勇顽强的部队，分别整编为新编第四

旅和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日本投降后，第一旅和第二旅抽调了部分干部和部队开赴华北、东北地区后，合编为教导旅，由罗元发同志任旅长兼政委。

一九四七年三月，当胡宗南向延安发动进攻之时，各兄弟部队还未完全到达延安。在这紧急时刻，这个教导旅曾在新四旅十六团、七七一团配合下，抗击了敌人几个旅，激战七昼夜，共同完成了掩护党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安全转移，与晋绥、陕甘宁联防军集结的任务。在西北战场上，他们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战役，圆满地完成了西北野战军给予的各种战斗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央军委前委决定新四旅、教导旅合编，组成第六纵队，由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一九四九年一月，根据全国统一编制，六纵队改为六军，由罗元发任军长，张贤约任政委。解放西安、兰州之后，我任一兵团司令员，徐立清同志任副政治委员。这个第六军归一兵团建制，也随我们进军新疆。此后，在肃清残敌、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都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

罗元发同志半生戎马生涯，经验丰富。近几年又两次回到西北各地，进行调查访问。他写出的这部革命回忆录，不仅记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的英明决策，而且生动真实地记述了彭老总、贺老总的指挥艺术。罗元发同志还以亲切的战友之情，记述了这支部队许多活着的和英勇牺牲了的英雄。如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十七师师长程悦长同志，全国特等战斗英雄胡青山、魏书庆同志；还有战斗英雄陈全魁、李国玉、尹振河；爆破英雄曹德荣，以及模范共产党员杜宏茂等同志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这种精神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精神。过去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和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战胜各种困难；今天，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征途中，更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只要有了这种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在党的十二大路线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王 震

一九八三年元月四日

目 录

为了新中国	(1)
记毛主席和我的一次谈话	
延安保卫战	(7)
蘑菇战	(31)
鞭抽二马	(56)
“过山坳”	(76)
宜川大捷	(84)
出师西府	(107)
荔北歼敌	(132)
解放西安	(149)
钳马打胡	(166)
决战兰州	(178)
大军西进	(197)
新的起点	(226)
追歼叛匪	(241)
天山屯垦	(262)
后记	

为了新中国

——记毛主席和我的一次谈话

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七大胜利闭幕了。我正匆匆准备行装，要回晋察冀去时，组织上却决定要把我留在延安的教二旅工作。眼看战友们一批一批返回了前线，而我却回不了熟悉的抗日战场，心里总平静不下来。六月十六日，七大闭幕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突然接到通知，下午四点钟到枣园去，毛主席要找我谈话。

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感到既紧张又高兴。在战争年代里，我虽然几次见到过毛主席，亲自聆听过他的报告、讲话和指示，但单独找我谈话，这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一时难以平静，许多往事不禁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一九四四年冬天，我作为七大代表，从晋察冀军区雁北的五分区回到延安。当我带着组织关系到总政治部组织部报到时，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笑着对我说：“回到家了，先休息几天。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这些从抗日前线回来的同志。‘七大’要延期举行，你先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一段时间。”于是，我就到中央党校参加了学习。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七大在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我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十五人为主席团，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大会举行期间，毛主席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总司令

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开了四十八天，结束时毛主席致闭幕词，即著名的《愚公移山》。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始终充满着团结精神。毛主席强调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毛主席最后挥手高呼：“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七大真正开成了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

会议结束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前线去。可是，聂荣臻司令员和彭真校长却给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要我留在延安的教二旅，接替邓华同志的工作。说真的，我是一心想回抗日前线去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部队干部，在抗日战争快进入最后胜利的时候，我怎么舍得离开抗日救国的最前线呢！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请聂司令员允许我回到晋察冀抗日前线，打日本侵略者。

谁知过了两天，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亲自找我谈话。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延安虽然是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是党中央所在地，但也是前线。八年来，国民党反动派一天也没有忘记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决定调几个旅回到延安，担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这几个部队都是老部队，老红军底子，有光荣历史。组织上决定调你去接替邓华同志任教二旅政委。”总司令又以商量的口气问我说：“罗元发同志，你看还有什么意见，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

总司令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他的谈话，使我领会到任务的光荣和艰巨。一个统帅全军的总司令亲自给我做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向朱总司令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愉快地到教二旅去工作。

正当我准备去教二旅的时候，一辆卡车开到我的住处，在一位同志陪同下，我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地枣园。

我刚从卡车上跳下来，毛主席就从他住的窑洞里走出来了。他穿着一套蓝色土布衣裳，戴着一顶八角帽，身体很健康。我疾步上前，向毛主席敬礼问候。毛主席笑盈盈地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问道：“你是罗元发同志？好，好。”

走进窑洞，主席招呼我坐在一把木椅上，他自己也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一个套间窑洞，十分简朴，外间是办公室兼客厅，靠窗口摆着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墙边放着两个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墙上挂着地图，地图上标着各种符号，纵横交错。里间屋里支着板铺，是主席的卧室。

一个战士端来茶水，主席呷了一口，微笑着对我说：“要你到教二旅去工作了，今天特地找你来谈谈。看你还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说：“本来我想回前线去，朱总司令、聂司令员和彭校长都给我谈了话，现在思想通了。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努力做好工作。”主席听了点点头说，这样好。其实想回前线去，这想法并不坏。我们边区虽是抗日后方，但也是前线，我们不能老唱“空城计”。军委决定调几个旅回陕北，是根据当前形势决定的。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胡宗南带着几十万大军在磨刀，我们不磨刀是要吃亏的，这叫有备无患。

主席接着说，你参加了七大，七大的精神很重要，要好好地组织部队学习。现在是两个中国之命运在决战。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为了新中国。他点燃一支烟继续说，抗日战争就要胜利了，可是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和蒋介石的想法并不一样，斗争还会继续。

我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独裁统治的。”

主席凝视着窗外的暮色，深沉地说，天亮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最黑暗的时刻，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天就亮了。我们要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这生动的比喻，给我以深刻的教育。好象一阵春雨洒落在禾苗上，主席精辟的论断，吹开了我的心扉。同时也为自己对留延安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惭愧。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工作、学习、战斗。

主席好象觉察到我内心的不安，用温和信任的目光端详着我，有意换了个话题，问我我是哪里人？今年多大了？什么时候参军的？象拉家常一样。我回答说是福建龙岩人，今年三十四岁，家中很穷。一九二八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参加了红军。主席掰着指头算了算说：你十七岁时，是红四军打到你们老家龙岩。那时候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们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主席说完站起身来在屋里踱了几步，要我讲一讲敌后情况。我简略地作了汇报，他听了之后又问敌后人民的生活和部队情绪怎样？我说：“由于敌人经常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敌后军民生活很苦，但团结抗日的战斗情绪很高。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敌后人民把什么都拿出来支援前线，配合我军开展游击战争，这是我军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条件。”

主席说，有这样好的人民，这样好的军队，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创建一个新中国。可是现在我们部队中少数人有一种和平麻痹思想，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觉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天下就太平了，该回家种地去了，忘记了几十年来国民党每时每刻都想消灭我们。

主席对部队情况真是了如指掌。我又向主席汇报说，在部队有些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打败小东洋，回家种地忙。老婆娃儿热炕上，小日子象蜜糖。

“人凡天下事，总得两厢情愿喽！”主席把手一挥继续说，“你要过小日子，蒋介石愿不愿意呢？现在蒋介石保存实力，把胡宗南集团的几十万人，摆在延安大门口，这是干什么呢？是帮我们守大门吗？还是想窜进来捞一把呢？我看他们是不安好心喽！因此，你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训练，提高警惕，防备国民党突然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已经打破了他们的经济封锁，我们还要随时准备打败他们的军事进攻。”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我当即表示，一定要按照主席教导带好部队，首先纠正和平麻痹思想，把教二旅的工作做好，使部队安心留守在陕甘宁边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

主席笑了笑着说：“这就好，教二旅的工作很重要。”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公务员来通知主席吃饭，我才慌忙起身向上席告辞。

主席把我按在坐位上，风趣地说：“今天为你回延安工作接风，顺便吃一顿家常便饭。”

我不再推辞，只好坐到桌边去。桌上摆着四盘菜：黄豆芽、罗卜丝、炒土豆和辣椒炒肉片。主席亲自给我盛了一碗大米饭，嘱咐我多吃点，不要客气。他还从辣椒中拣出几片肉放在我碗里说：“这些菜都是中央机关自己种的，国民党想在经济上封锁我们，倒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路。这是‘蒋委员长’的一大‘功劳’。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生产中出了大力，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取得了很大成绩。你们现在接了他们的防务，也要在南泥湾、金盆湾一带好好生产、训练，做好准备。一旦打起仗来，那里就是保卫延安的主要战场。”

饭后，主席又要我和他一起到小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直到深夜，我才回到住处。

我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放牛娃，从小受尽地主老财